

“莫 将 仇 恨 付 秋 风”

——读任锐同志诗一首

马 良

儿父临刑曾大呼：
“我今就义亦从容”。
寄语天涯小儿女，
莫将仇恨付秋风。

这首七言绝句，系孙炳文烈士的夫人任锐同志，由重庆赴延安途中所作。时在一九三八年。

孙炳文烈士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。早在青年时代，他就怀着改革社会的志 愿，和朱德同志结伴旅欧，寻求革命真理。一九二二年，在马克思主义的故乡德国，经周恩来同志介绍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从此，他便把自己的一切，无条件地献给了伟大的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。孙炳文同志回国后在上海从事党的工作，积极参加了周恩来同志领导的上海工人武装起义。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，蒋介石反动派公开背叛革命，血腥屠杀工农，孙炳文同志亦惨遭杀害。“儿父临刑曾大呼：‘我今就义亦从容’。”孙炳文同志的牺牲是很悲壮、很英勇的。他的英雄事迹，受到革命人民的尊敬和欣佩。

孙炳文同志遇难以后，任锐同志勇敢地担负起抚养革命遗孤的责任。在白色恐怖下，经历了十一年艰难困苦的生活。她在另一首《送儿上前线》的诗中写道：“五龄父罹难，家贫缺衣粮。”其艰苦之况，由此可见一斑。

一九三八年，周恩来副主席在重庆找到了任锐母子，久别重逢，百感交集，随即把她们送往延安。

在多年颠沛流离之后，终于找到了组织，找到了党，即将到达日夜向往的革命圣地——延安，即将见到人民的大救星毛主席，任锐同志的喜悦激动之情是可以想见的。她回顾孙炳文烈士在刑场上从容不迫的英雄气概，寄语已经投入革命军队的“小儿女”，告诫他们要永远记住蒋介石反动派欠下的血债，为人民解放事业奋斗终生。诗中悼先逝者之志，励后来人之心，于悲壮中见激昂，言有尽而意无穷，抒发了一位革命母亲的磊落情怀。今天我们读起来，仍感受到谆谆的教诲与深切的关怀。

这里需要特别指出，任锐同志当年“寄语天涯小儿女”之一的孙维世同志，就是大型话剧《初升的太阳》的编者。当年，她随母亲来到延安，受到毛主席、周副主席、朱总司令的直接关怀。后赴苏学习，建国初期毛主席首次访问苏联，就是她担任翻译组长。此后，她转到文化战线，担任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副院长。一九六四年，她接受周总理指示，来到大庆，经过长期的艰苦的磨炼，创作出大型话剧《初升的太阳》，受到周总理和大庆工人阶级的赞扬。正当她总结经验，准备把《初》剧搬上银幕的时候，文化大革命开始了。红卫兵小将走上社会，大破“四旧”，使得叛徒江青惶惶不可终日，生怕自己那些见不得人的罪恶历史材料落入人民群众手中，于是她白天说人话，夜里搞鬼事，嘴里高喊“支持小将的革命行动”，暗则勾结林彪死党，采取特务手段，秘密收缴、转移、销毁有关他们反革命历史罪行的种种材料，对了解他们罪恶历史的知情人，则捏造种种罪名，横加迫害。一九六七年，江青得知孙维世同志了解她的叛徒罪行，立即与林彪的一个死党密谋说：“现在趁乱的时候，你给我去抓了这个仇人，你有什么仇人，我也替你去抓。”她们相互勾结，狼狈为奸，把孙维世同志打成“特务”，迫害至死。这是叛徒江青欠下的又一笔血债！

孙维世同志和她父母一样都是革命的硬骨头。她藐视江青的淫威，大义凛然，坚贞不屈，一息尚存，斗争不止，充满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。在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时候，她坚信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定胜利，江青及其同伙终将在阳光下露出原形，受到无产阶级专政的惩罚。今天，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继承毛主席遗志，一举粉碎了祸国殃民的“四人帮”，孙维世同志的沉冤得到昭雪。烈士有灵，定当含笑于九泉之下！

我们同“四人帮”的斗争，是国共两党长期斗争的继续。二十年代，蒋介石杀害了孙炳文烈士；六十年代，江青又害死了烈士的女儿孙维世同志。江青与国民党反动派有千丝万缕的联系，代表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，干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勾当，双手沾满无产阶级的鲜血。“寄语天涯小儿女，莫将仇恨付秋风。”我们每一个革命后来人，都要牢记革命先烈的遗言，把对“四人帮”的深仇大恨，化作揭批“四人帮”的强大动力，在华主席、党中央领导下，打好第三战役，把揭批“四人帮”的政治大革命进行到底！

〔附记〕任锐同志于一九三八年到达延安，先后在抗大和马列学院学习，一九四九年病逝于天津。《革命烈士诗抄》收录她的两首诗，《重庆赴延安途中口占寄儿》即其中一首。由于“四人帮”的压制，烈士遗作多年遭受禁锢。打倒“四人帮”，广大烈士的英雄事迹和光辉诗作又得以重新和广大群众见面。这是一件很值得庆贺的事。